



西南聯大 与中国校园文学

李光荣 著



人民出版社

西南联大

与中国校园文学



李光荣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惠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李光荣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01-013678-3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0335 号

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

XINAN LIANDA YU ZHONGGUO XIAOYUAN WENXUE

李光荣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29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ISBN 978-7-01-013678-3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校园文学的文化意义（代序）

李光荣教授关于西南联大校园文学的新著就要出版了，来信嘱我作“序”。作为光荣教授多年的朋友，我自然不敢拒绝，只是对西南联大校园文学本身的研究却远不及光荣教授之专之深，所以在这里不敢妄议，只能借此谈一谈对校园文学的一些认识。

校园文学，这个词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中国新时期的校园文学兴盛一时，新时期的“朦胧诗”运动（“新诗潮”）有校园作家的参与，作为这一运动最早的民间总结——《新诗潮诗集》就来自北京大学的五四文学社，第三代诗歌中赫然名列有“大学生诗派”，北京师范大学的五四文学社则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算是对新时期校园诗歌的一次重要扫描。以后，批评家与史家又沿波讨源，将校园文学的踪迹一直追溯到 20 世纪上半叶，甚至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步。

胡适正是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目睹了“意象派”诗歌运动，并将其中的精神引入到了中国，成为《谈新诗》的基本逻辑；日本校园的“学堂乐歌”则同样启发了留日的中国诗人。至于李光荣教授致力多年的西南联大校园文化，更是将中国现代文学推上了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峰。

在我看来，讨论校园文学，重要的还不仅仅是这种源流的梳理和总结，重要的是挖掘其中造就和影响中国文学的内在精神：究竟校园文化给了我们现代的文学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现代的校园文化最终形成了现代文化怎样特殊的素质？

校园文化首先来自民国社会的历史环境。

科举制度结束之后，大学与出版传媒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

两大生存场所。在前者，我们看到了容纳不同学说与思想的北京大学，见识了以“兼容并包”闻名的大学校长蔡元培，与其说是蔡元培个人的仁厚接纳了形形色色的思想人物，毋宁说就是五四文化圈多重思想倾向并存的现实扩展了这位现代管理者的思维空间，并最终通过新型的校园文化的存在为现代思想、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教育制度的存在则为文学新生力量的成长创造了文化条件，也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自晚清开始，中国教育逐步形成了国立、私立与教会教育的三足鼎立之势，在今天看来，这些教育大体上实践了教育独立、中西会通的原则，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晚清中国教育先是接受了德日中央集权模式的影响，官办学校成为教育的主体，然而这一政治与教育联合的中国方式却不断遭遇到具有留洋背景的新知识群体的批判和抨击，加之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中央政权实际上无法有效地将自己的政治理念贯穿到校园之中，民国政府的教育部于1912年—1913年制订颁布的民国第一个学校制度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其中的《大学令》、《大学规程》等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已经包含了若干废除忠君、尊孔等旧教育宗旨的内容，同时如校内设评议会、教授会等机构，则开始效仿英美大学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思想。“五四”时期在教育界更开展了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倡行教育独立的运动，“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现代公民教育思想成为全国教育联合会太原年会的决议。大学独立的理念深入人心，即便军阀办大学，也不得不表现出对教育的相当敬重，或者借兴办教育博取自己的社会声誉，国民党努力推进“党化教育”，却一直受到校内外各种力量的抵制和反对，彻底的“党化教育”从来也没有在民国实现过。正是这样的教育环境为现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思想独立、个性鲜明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又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创造活动揭开了中国文学崭新的一页；当这些写作者走出各级学校的大门，便成为勇于承担社会道义的中坚，为民族忧思，为民众呐

喊，为理想奋斗，而生存于校园的人们，也能够利用相对优越的物质条件进行文化的融合与知识的反思，在不同阶段接受过民国学校教育的青年可能分别形成了社会派作家和学院派作家，他们兴趣有别，优劣均在，但认真观察，却都自有其独立的文学贡献，奔波于底层社会的左翼革命文学同样受惠于民国教育。

当然，这样思考问题，校园文化的多副面孔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比如从20年代鲁迅开始的对学院知识分子的警惕甚至厌恶，这样的多面性提示我们学术研究必须保持格外清醒的头脑。

在另外一方面，校园文化也是充满变异性的，也就是说，并没有“本质化”的校园文化，应该特别注意其中的重要改变。例如抗战，正是抗战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包括校园文化，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作家群则利用高等教育的资源进行了独特的文化与生命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由此而更加丰富和生动。

多年来，从云南蒙自到昆明，李光荣教授步履匆匆，一路追踪西南联大的身影而行，他已经为我们的学界贡献了好几种相关的著作，既有史料的披露，也有理性的思考，可以说是国内影响很大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者，他的著作常常给我启发，给我重新认识历史与校园的灵感，我自己对穆旦、冯至、卞之琳等学人的研究虽然缺乏光荣教授那种明确的“联大视野”，但观照校园文化，特别是挖掘校园文化的自我更新却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光荣教授的思考有一种深切的理解与认同。

感谢光荣教授给了我一个重读“校园文化”的机会，并从中获得反思当下、警醒自我的力量，因为，今日安享于校园“中产”迷幻的知识分子，最应该回首当年，比照民国当年的校园种种。

李怡

2013年12月12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队伍	20
第一节 南湖诗社	20
第二节 高原文艺社	32
第三节 联大剧团	42
第四节 南荒文艺社	62
第五节 冬青文艺社	73
第六节 文聚社	87
第七节 文艺社	97
第八节 新诗社	106
第九节 剧艺社	121
第二章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创作	138
第一节 南湖诗社的诗作	138
第二节 高原文艺社的创作	152
第三节 冬青文艺社的小说创作	171
第四节 文聚社的诗歌创作	185
第五节 新诗社的诗作	197
第六节 剧艺社的舞台创作	214

第三章 西南联大社团成员的创作	225
第一节 刘兆吉《西南采风录》的方言特点	225
第二节 穆旦在南荒文艺社的创作	247
第三节 方龄贵的旅行散文和抗战小说	255
第四节 汪曾祺的初期小说	266
第五节 王松声的《凯旋》	282
第六节 郭良夫的《民主使徒》	291
第七节 杨明《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	297
第八节 缪弘的遗诗	307
结 语	321
参考文献	325
后 记	332

导 论^①

摘 要 校园文学是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物。西南联大校园文学除了具备校园文学的一般特点外，还表现出反映社会人生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缘于西南联大所处的特殊时代和西南联大作家的特殊生活：从北到南的大迁徙使他们认识了社会现实，市井生活使他们体验到民生疾苦，国家民族使命使他们创作抗战文学，军旅生涯使他们思考战争的问题。西南联大具有不同于一般校园的新文学环境，学生在文学社团中学习成长，自由创作，产生了能够代表中国校园文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杰出作品。这些作品确凿表明：西南联大校园文学是 20 世纪中国校园文学的一座高峰。

一、关于校园文学

关于校园文学，迄无定论。但在中外各种观点中，有两点认识是一致的：第一，校园以内的文学，第二，学生创作的文学。“校园以内”是说文学作品产生于校园，而不是把文学题材框范于校园。校园内的作家描写校园以外生活的作品也属于校园文学，而校园外的作家即使所写内容是学校生活也不一定是校园文学。复杂的是对于校外作家描写校园生活的作品的定位。大家倾向较为一致的是学生在校园里构思，在离开校园后不长的时间内反映校园生活的作品，应该算校园文学。而作者早已作为“社会人”所写的文学作品，或者以社会学的思想剖析校园生活的文学则很难归入校园文学之内。“学生创作”指作者身份而言。校园文学的作者以学生为主体，而不包括教师作家。关于教师作家仍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

^① 本文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原题《中国校园文学的一座高峰——论西南联大学生创作》。

既为校园文学就应该包括教师作家，一种认为教师作家多以社会人生为描写对象，已超出校园范围，有的甚至引导着文坛的风潮，不能算作校园文学作家。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又都有所偏执。教师作家有年龄、水平、名望之分。老教师作家固然难以算作校园文学作家，但年轻的教师作家得作细论。有的学生作者毕业后在学校做教师并继续从事创作，尤其是有的学生作者毕业后留校任教，虽然身份变了，但其文学场域仍然是先前的场域，其作品与学生时代所写并无大的变化；即使毕业离开了校园，仍与校园保持着密切联系的青年作者，其创作仍继续校园创作的路数，有的甚至照旧参加校园的文学活动，作品仍在校园刊物上发表，恐怕应该继续算作校园作者。简言之，离开学校不久的学生作者，虽然身份变了，但其文学场域和作品风格没有变，就不能把他们排除在校园文学作家之外。

关于校园文学的创作特点，也有两点是大家的共识：第一，反映校园生活，第二，通过社团运作。“反映校园生活”只是其主要内容或倾向，或者说是内容之一，不是校园文学的全部内容或倾向，这正如上文所谈反映校园生活的不一定是校园文学一样。有的学生所写的内容超出校园之外，具备了社会人生的内容，也不能说它是社会文学，因校园文学概念的要点是“产生于校园”和“学生创作”的文学。有的学者根据校园生活的特点把校园文学等同于儿童文学、少年文学、青春文学，则更为狭隘，且在概念上与这些文学种类发生了混淆，实不可取。由于否认校园文学的内容可以超出校外的观点与校园文学的定义的外延不相符合，有的学者把它修订为“通过校园生活反映社会人生”。但这样的修订仍是狭隘、徒劳的。学生生活并不局限于校园，有时甚至完全离开了校园而属于社会性的，为什么其作品一定要“通过校园生活”才能“反映社会人生”呢？因此，“反映校园生活”只是校园文学的主要特点，此特点可以扩大为以反映校园生活为主兼及社会人生。“通过社团运作”确实是校园文学的一个特点。事实表明，校园文学作品大多出于社团，那些著名的校园文学作家大多是文学社团的骨干人物。文学社团的作用是组织文学创作队伍，提高社员的创作兴趣，推动文学创作的发

展，并在此过程中培养文学人才。所以，校园里的文学爱好者往往会发起组织文学社团，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同时自己也得到提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的中学生文学社团上万个，大学生文学社团也有数千个，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创作力量，也是未来文学的希望。有鉴于此，研究校园文学必须从校园文学社团开始。

关于校园文学的完整定义，学界至今未能确定。但可以相信，研究者们通过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将来是会做出来的。我固然有些思考，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概念之争”，在此暂且不谈，而直接运用大家已形成的相对共识，写出以上文字作为我下文将要展开的校园文学研究的理论依据。

但是，仍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

其一是校园文学能不能产生杰作？

这仍然要看如何定义校园文学。如果把校园文学的范围和特点局限于校园里学生创作的反映校园生活的文学，恐怕产生杰作的可能性较小。而如果按上文的倾向，把校园文学看作是学生和脱离学生身份不久的年轻教师以及文学青年继续学生时代的创作，那么校园文学是能够产生杰作的。这不是小觑学生创作的质量，而是扩大了校园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中，不仅包涵了反映校园生活的作品，还包括了反映校园以外社会生活的作品，在外延内，既有学生的创作，也有“后学生”的创作。只要看一看中国校园文学的历史，就知道此言不谬。文学的成就似乎与年龄不成正比。虽然“庾信文章老更成”，但“成”的主要是技巧，不见得是思想观点。今天公认的作家代表作大多是作家的少壮之作，较少晚年巨著。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大家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写于他们创作的早、中期，举凡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艾青、赵树理等等无不如此。若以本题校园文学而论，有必要说说大家所熟悉的“曹禺现象”。曹禺 23 岁，还在清华大学做学生时就写成了名震遐迩的杰作《雷雨》，他接着写出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巨作，建国后，他“成熟”了，却写不出名作了，他在晚年决心写一部“大作”，却无从下笔，直至带着未写出好作品的遗憾离开了人

世。曹禺虽然是一个典型，但也是一种普遍现象。由是观之，你能否认校园文学能够产生杰作吗？

其二，校园文学产生于何时？

研究者一般认为，中国校园文学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把校园文学的起点定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认为校园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品种，其标志是《中国校园文学》的创刊。这种观点所说的“起点”实际是“校园文学”概念的提出时间，而不是校园文学的产生。事实上，校园文学是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物。古代的私塾不教写作，很难有学生写的作品传世，杏坛、书院里虽有学生作品，但未成气候，可以看作校园文学的滥觞，但还不是今天所谓校园文学。现代教育办学堂、学校，尤其是设立国文学科，集中学生学习和写作，于是有了校园文学。所以，校园文学自现代学校始，有学校（学堂）就有了校园文学。校园文学随着新文学的提倡而转型，成为新文学的主要创作力量之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北大、清华的学生创作是 20 世纪初叶校园文学的代表。那时，校园文学融汇于现代文学，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部分，校园师生作家甚至充当了现代文学的主要作家，评论家论述的现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校园文学。这样，校园文学反而没有受到学者的关注，不能把它提出来做专门的研究，校园文学因而湮没于现代文学之中了。那些认为校园文学起源于改革开放的学者，并不是对此前校园文学的无知，而是“无视”，他们不承认以前的学生创作是校园文学，因为那时的校园文学大多描写社会人生，超出了校园围墙，不符合他们的定义，也就顾不上“学生作者”和“产生于校园的文学”两个义项了。概言之，校园文学起于近代，是现代大学体制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包涵了校园文学，现代校园文学成就巨大，值得研究。

二、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学

根据上述校园文学的内涵和特点，西南联大的文学属于校园文学。过去很少有人从校园文学的角度研究西南联大文学，大概缘于

两个原因：一是没有对西南联大文学进行发掘。在人们的观念里，一提到西南联大文学，便是那些杰出的作品及其作家，如冯至的《十四行集》《伍子胥》，沈从文的《长河》《烛虚》，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山山水水》，学生作家是“联大三星”“九叶诗人”外加汪曾祺等，而众多的西南联大学生作家的作品，鲜有人知，例如：《鼓》《舞》《新生》《司钟老人》《野老》《露营》《二憨子》《兽医》《逃去的厨夫》等作品，可能大多数西南联大文学的研究者亦未必知道。这必然影响到研究者对于西南联大文学的判断，致使他们不能从校园文学角度去考察西南联大文学。二是认为作为校园文学来看待会降低西南联大文学的价值。因为一般研究者认为校园文学就是反映校园生活的文学。有学者曾把《倪焕之》作为校园文学的“杰出代表”，但《倪焕之》并不是20世纪校园文学的一流作品。在这种观念之下，如果把西南联大文学作为校园文学看待，就等于说西南联大文学只有“校园内容”，而没有杰作，因而降低了西南联大文学的地位。所以研究者不把西南联大文学看作校园文学。即使偶然有人在研究中提到“校园”，如说穆旦是“校园诗人”，也并没有从校园文学的角度去研究，更没有引起共鸣。而在事实上，西南联大学生文学的题材是超出校园的——这更是不把西南联大文学当校园文学看待的“依据”。现在，以上两点都不是问题了，所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从其内涵和特点看是校园文学：

首先，西南联大文学中半数以上的作品是学生创作的。一般认为，西南联大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教师作家甚至是著名作家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燕卜苏、钱锺书等创作的，学生只有穆旦、汪曾祺、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几位，而成就较大的是教师作家和“九叶诗人”及汪曾祺。其实不尽然。新近出版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一书，选入66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教师作家只有17位，其余全是学生作者；选入作品91篇，其中27篇为教师所作，其余全是学生的作品。^①这一数字说明，西

① 李光荣编：《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南联大文学创作的主力军是学生而不是教师，虽然学生个人的创作量不一定比某些教师个人的创作量大，但有的学生个人创作的数量也不少，而学生作品的总量则超过了教师创作的总量。可以肯定地说，西南联大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不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那些，而未知的多数是学生发表的作品。既然西南联大文学作品主要是学生创作的，符合大家公认的校园文学基本定义中“学生”和“校园”的义项要素，自然可以把西南联大文学作为校园文学看待了。至于其中老师的创作即非校园文学的部分，可以另作研究。这种情形各个学校都存在，是校园文学研究遇到的共同问题，非为特例。

其次，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创作是通过社团来运作并推进的。中国 20 世纪社会组织的一大特点是社团兴旺。为了聚集力量从事某一项工作，人们组织了形形色色的社团，社团从而成为民间组织的一种形式。学生社团即是这种民间社会组织形式在校园中的表现之一。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西南联大学生先后组织过一百多个社团，包罗各个学科，并涉及生活、娱乐、休闲等五花八门。有的社团昙花一现，有的社团长达数年。可以说，组织社团成为西南联大学生生活的一种风气，社团活动是西南联大学生开展工作的一种方式。这些社团中，有十几个是文学社团。关于各文学社团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作具体阐述，这里只谈文学社团的功能。文学社团的首要功能是组织文学创作队伍。文学社团是文学爱好者发起组织的，组成后又把更多的文学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形成集体力量，开展文学创作。因此，文学社团的次要功能是创作文学作品。为了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文学社团往往开展一系列工作：激励创作情绪是其一，相互交流切磋是其二，举办文学讲座是其三，创办刊物是其四，推荐社员作品发表是其五，社团之间还暗自形成竞争，其结果自然是繁荣了创作。文学社团在活动中获得了最后一个功能：培育文学人才。社团初建之时，除几个骨干具有文学创作的经验外，大部分社员只是抱着一腔热情参加，在文学社团的激励下，在老社员的带动下，在写作的具体实践中，新社员的创作能力得到提高，逐渐成长为文学创作人才。西南联大学生作者很少有没参加过

社团的，换言之，西南联大学生的作品绝大多数出自社团成员。西南联大学生作者与文学社团的关系如此密切，具备了一般认为的“学生文学往往与社团有关”的校园文学特点。

西南联大学生的创作除了具备一般校园文学的特点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这就是社会性。

“社会性”是西南联大校园文学与生俱来的特点。今存较早的学生诗歌《野兽》用野兽形象象征中国人民抗敌意识的觉醒，最后的一批作品则表现出强烈的反内战思想，而其间的文学，大多是对社会、人生、战争的描写，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意识。当时社会的最大特征是战争，西南联大学生的作品也较多反映了战争，或者直接描写，或者间接表现，或者把战争作为背景，即使一些“远离战争”的作品，也摆脱不掉战争的阴影，其作品所写的社会是战争环境中的社会，所写的人生是战争时代的人生，因此可以把战争作为西南联大校园文学社会性的核心内容来看待。《未央歌》的“纯净”实在只是一个特例，不能代表西南联大学生文学的总体风格。社会性的表现，有些是与校园生活结合的，即“通过校园生活反映社会人生”，有的则远离校园直接描写社会人生，看不出校园生活的影子，甚至读者会想不到该作品出于学生之手，但它们实实在在是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学。如果用“反映校园生活”的标准去框范西南联大文学，是不适当的。

形成西南联大校园文学社会性特点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对中国校园文学传统的继承。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本是我国校园文学的先锋，早期北大、清华的文学和南开的戏剧都闻名于全国，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代表着新文学某个方面的水平。而其校园文学的显著特点是对社会人生的关怀。三校的校园作家都很自觉地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反映民间疾苦，却很少眷顾自己的小我而把个人的忧愁放大给别人看，即使写爱情，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迹。这种倾向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由三校师生带入西南联大。还在迁往昆明的途中，师生们就不失时机地了解社会、考察民情，收集民歌，写“旅行”记录，到了云

南，一篇篇文章，一首首诗歌，一本本书籍相继写出并面世，开创了西南联大文学的局面，奠定了西南联大校园文学的风格基础。北大、清华校园作家出身的教师和西南联大学生文学社团的导师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李广田、冯至等，以及作家沈从文，无论在课堂上还是讲座中，或是与个人的谈话，都强调个人对国家、民族、时代、大众应做的工作和应尽的责任，要求文学担负起历史的使命。他们指导着文学社团活动，引导了校园文学的方向。从社团文学创作的实际看，西南联大文学是按照导师们引导的方向，沿着前几届学长开创的道路发展的，直言之，西南联大校园文学继承了中国校园文学的传统而又有所开拓发展。

其二，是西南联大的校园生活决定的。西南联大是一所敞开大门的学校。一方面学校里举行的活动，社会人员可以参加，包括老师上课也可以随时来听，甚至学生宿舍里也有社会人员借宿；另一方面学生走出校门，有的参与编报纸或杂志，有的在中学任教，有的兼职做社会工作，有的打零工，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广泛的联系。此外还有三点是其他任何时候的任何大学都没有的。第一，从北到南的转移。师生从北京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举行了行程数千里的大迁徙。其中最不同凡响的是从长沙步行三千多里到达昆明。第二，散居民间的市井生活。师生租住民房，与普通市民朝夕相处。西南联大师生的住所遍及全城，形成了昆明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的“校园景观”。第三，从军抗日。据不完全统计，在西南联大八千学生中，有一千多人从军抗日，多数进陆军，少数入空军，近在昆明，远达缅甸、印度，有的在后勤搞服务，有的持枪上战场。特别是美国空军援华大队到来，其翻译人员大多由西南联大师生充任。这些情况说明，西南联大学生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昆明城以至更宽的社会空间。学生广泛而深入地接触社会，在某段时间内甚至融入社会，变成了“社会人员”。这种生活必然带来亲历者对社会人生的深入认识。作为文学作者来说，这种生活带给他们的是对社会人生的抒写：写社会犹如写校园，写他人则融入了自我。假若抽去对于社会人生的描写，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学便苍白无

力，甚至失去了意义。也是这种生活，奠定了西南联大校园文学的风格，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校园文学的成就。可以说，在中国的抗战文学中，对于战争的批判和人性描写的深度，很少有能超过西南联大文学的。

三、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

西南联大学生文学社团此起彼伏，贯穿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过程中，成为西南联大文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以至研究西南联大文学必须先研究文学社团。这就是我当初全面研究西南联大文学时，选择从文学社团入手的原因。

西南联大的著名文学社团有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文艺社、新诗社、西南联大话剧团、剧艺社等。以文艺类别论，这些社团中有专业社团和综合社团两类。专业社团如从事诗歌创作的南湖诗社和新诗社，从事戏剧演出和创作的联大剧团和剧艺社；综合社团是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文艺社等，综合社团各体文学皆写。从文学活动看，无论专业社团还是综合社团都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共同之处。共同之处有二，其一是队伍庞大。每个社团的社员都是几十人，南湖诗社较少为20人，文艺社最多的时候60人，戏剧社团因多幕剧的演出需要，社员总在数十人，临时参加演出的则更多，如公演《阿Q正传》时，共有二百多人参加工作，新诗社组织开放，不固定社员，有时一次活动的参加者就达一千多人。而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每年的招生数只有十多人，哲学心理学系仅为几人。那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又是一个热血沸腾朝气蓬勃的年代，同时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所以，文学社团兴旺发达。其二是开办文艺园地。作为学生和校园文学社团，办得最多的是壁报。在上述九个社团中，除文聚社和联大剧团之外，都办有壁报，冬青社的杂文壁报除新校舍外，还一度出了南苑版和师院版。有条件的社团则办有报纸或杂志，如文艺社创办《文艺新报》，文聚社办有《文聚》杂志和《文聚副刊》。戏剧社团则用演出的形式发表自己的创作，联大